

破解围挡扰民还需精细化管理

西安市市政公用局近日表示,市政部门将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市政道路围挡专项整治活动,最大程度削减工地围挡,还路于民。这或许意味着,让西安人苦不堪言的因为围挡而造成的拥堵,在未来能够得到些许缓解。

市政道路围挡,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市民的生活。这些施工围挡给行人和车辆的通行都带来了不便,还影响着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风貌,同时也给城市环境卫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有时候一个路段今天电缆施工,明天水管施工,后天煤气施工,一年到头几乎没几天畅通,让人无可奈何。

应该说,一个正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城市,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也必须付出一定的发展代价——今天堵是为了明天的畅通,今天我们忍受堵是为了后来人的不堵。但是,公众对公共

事业建设的理解,并不意味着相关单位可以对道路进行高频次的“开膛破肚”,让其成为“马路拉链”。要知道,“马路拉链”不仅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政府的形象与治理水平。

坦率来讲,围挡扰民问题,在西安算不得新问题。近些年来,西安市对城市的道路施工围挡问题也多次进行整治,2010年,西安主要领导就曾明确指出:“对道路施工的时间安排不够科学,有的是在道路上集中施工,有的是工期没有安排好。有的地方围起来十天八天后却没人在那里施工。”彼时,主要领导指出问题的症结,甚至严厉质问“是否有腐败问题”之后,问题才暂时得到缓解。

事实上,公众对于围挡的要求并不高,从来没有谁会幻想“既要修好路,又不能丝毫影响我出行”的好事,市民所希望的仅仅是,相关单位在围挡施工的时候,

能够多为市民考虑,能够将影响减到最小。说白了,减少施工围挡就是个精细化管理问题,就是围挡这类施工安排能否系统考虑、周密安排的问题。

日前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在对地铁围挡占道情况专程调研时就发现,某围挡内堆放的材料10天以后才使用,就指出:“这些堆放材料、加工材料的地方都有缩小空间,应该挪出施工现场,缩小围挡,让出更多通道给群众。”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这次整治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将施工工人的生活用房移出。由是观之,解决围挡扰民问题,就必须要有系统化的规划,就必须从这些细微之处多想想、多问问能不能再给市民“让让”?毕竟,一处堵或许影响不大,但如果处处围挡都堵,则是让市民无比懊恼的事情。

对于市政部门主导的这次专项整

治,无疑是值得期待的,毕竟,公众的呼声与困扰,在治理者那里得到了有效回应,这种良性的互动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不过,有必要提醒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安还离不开围挡,所以,专项整治有必要转化为长效机制,只要有围挡存在,就严格依法监管。此外,一定要有必要的惩治措施,使得不严格依照规定施工的单位、不严格履行职责的部门和个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唯此,整治才有意义,才能长久。

我们相信,经过整治,围挡扰民问题会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但同时,公众更希望的是,在日后的城市治理中,在包括围挡扰民的所有问题中,监管部门都能“心存百姓”,以精细化管理的心态,来认真对待城市中所有的“看起来很细小,却直接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情,最大程度地给市民“多些方便,少些添堵”。

田德政

管理学生不能只做减法

近日,民大附中在学校贴出禁止学生购买外卖的通告,引发不少学生热议。对于这一禁令,民大附中官方通知中的缘由解释是,“防止学生误食不合格、不卫生食品等造成意外后果”。而学生们纷纷表示自有苦衷,“去哪里吃东西是我们的自由,而且学校食堂的饭实在太难吃了。”(11月7日《北京青年报》)

如发现违规同学,抓到后第一次将口头警告,第二次全校通报,两次以上通知家长到校给予学生相应处分。保安称,学校禁止一切外卖,即使是家长也不能送。最近教育部门和学校围绕中学生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不断推出新招。日前,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明确规定中小学不得出售碳酸饮料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饮料。理由是:碳酸饮料会引起骨质疏松、肥胖等。此条规定一出,还是赢得了多数学生家长的好评。与之相比,学生叫外卖记处分的规定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对于学校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发的禁令,有学生表示了异议,学校食堂的卫生等级是B级,学校周围餐厅的卫生等级同样是B级,何以存在安全问题。学生叫外卖说明学校无法满足寄宿学生的饮食需要,比如饭菜质量不高、饮食管理无序等。作为校方管理者,应首先看到问题的存在,看到学生的集体需求,从如何改善饮食服务入手,在管理上做加法而不是一味做减法。高中生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对食物的要求很高,学校最好给学生多几种选择,帮助学生去认证哪些外卖有资格,帮助他们去辨识哪些食物既安全可靠又健康营养。

全封闭管理的寄宿制学校可以参照军事化管理,但毕竟不是军事化院校,在某些管理上应该留给学生相对自由的空间。高中生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和自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的快速传递,他们的普遍需求和知识面一样都在扩大。学校对外卖的管理一刀切,无疑是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变化,一味抑制需求只会让需求逆向成长。当然,学校从学生的安全角度考虑问题无可厚非,但是毕竟外卖与校内食堂存在竞争关系,经济利益的保证是否也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学生的管理,在其成长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无论怎样,多一些加法,少一些减法,多一些柔性举措,少一些刚性约束,多一些理解关怀,少一些冷漠无情,总是更容易获得学生和家长的信赖与支持。

宋华

要有陈景润 也别忘了钱钟书

最近,一项名曰“数学滚出高考”的调查中,七成人表达了支持的意见。对此,有观点认为,学数学不是为了数钱,还可培养逻辑思维;也有地方教育考试部门回应称,会考虑大家的呼声。而对于数学该不该“滚”出高考,大家一直争论不休。

记得此前有一项针对奥数调查“你赞成取消奥数吗”,有近九成的参与者表示赞成。如果简单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决策,处理结果就是高考取消数学、禁止举办奥数班。怎样理解上述调查,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是很重要的。在笔者看来,上述调查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成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真实的数学需求。

七成人赞成“数学滚出高考”,是觉得高考数学太难,根本没必要学;九成人赞成“取消奥数”,是自己没有数学兴趣,这种培训除了增加负担之外,毫无用处。与之对应,就需要分析为何还有三成人赞成高考保留数学,以及一成人反对取消奥数了。单从调查看,这些人要么认为数学十分重要,要么是对数学很有兴趣。其实,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也就5%-10%左右,国外的奥数就是针对这些学生开展的。我国奥数的问题是“全民奥数”,九成人反对完全可以理解。而如果取消奥数,那剩下一成对奥数感兴趣的学生,该怎么办?

由此可见,教育需求是多元的。不管学生有无数学兴趣,今后的学业和职业发展是否需要数学,对所有学生提出“一刀切”的数学要求,高考用一张数学卷考查学生,进而,八九成对数学不感兴趣的学生陪着一两成数学高手,“攻读”高难度数学,这一学习过程与培养逻辑思维无关,只是为高考分数而搏斗。这好比让钱钟书先生一定要学数学一样。

这样的数学教育遭遇尴尬不奇怪。解决的办法,在于把选择学习数学的权利,交给受教育者。有学术兴趣的,可以选择读高难度的数学,将来成为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有专业需要的,可以选考数学,并以数学成绩去申请相关大学、专业;不喜欢数学,且今后用不上高难度知识的,只需上基本数学即可。当然,这不是指学校为他们确定上哪一难度的数学,而是由学生自己选择。

实行这样的教学,还需相应的大学招生制度支撑,即大学自主招生、多元评价,每所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专业特色,提出不同的学科、成绩要求,学生自由申请。按照这种录取制度,中学就不再要求学一样难度的知识,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和难度。学生各得其所,还会出现“数学滚出”、“英语滚出”的不满情绪吗?因此,改革我国的招生录取制度,关键是吧各学科教育从应试中解放出来,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培养学生的个性与兴趣。

熊丙奇

靠“限”解不了停车难

“北京交通管理部门建议,把拥有(购买或租赁)停车位,作为申请小客车摇号资格审核条件之一”——这条消息一出,刺痛了不少苦苦摇号和争抢车位的市民。难解的首都交通问题,因摇号难、停车难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

虽只是“建议”,不过,其引发的公众质疑、不满,仍值得深思。这背后,其实是对城市如何治堵、公共政策如何制定的一些思考。

停车难,是北京城市管理中的紧迫难题。机动车,是首都治堵、治霾两大工程的交汇点。一定程度上,机动车驾驶人既是“堵”和“霾”的制造者,又是受害者。城市的环境容量有限,北京再也无法承受前些年那样的机动车爆发式增长了。用车成本的上升和出行权利的受限,是一种客观趋势。

为缓解停车难,北京此前不断推出相关政策。2011年实施的“购车摇号”,限制了无数购车人的权利,也让首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的时间延后了11个月,客观上减缓了停车难的升级。之后,通过上涨中心城区停车费的方式,以经济杠杆平衡,但还是未能根治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看一看这些数据吧:北京现有机动车为540万辆,正式停车位却只有276万个。车位缺口如此巨大,交通管理部门自然“压力山大”,想出“摇号者须有停车位”这一招,也有其无奈。

可以想见,如果此招一出,将令市民的购车门槛再度提高,部分市民的不满也正在于此。当然,最大的不满还在于,相关部门一味靠“限”破题的管理思路。

事实上,凭车位购车的这一做法,北京也曾执行多年,最终因停车位赶不上汽车数量的增长,出现大量“泊位证明”造假现象,而被停止执行。今天反思,造假行为的背后实则是“车”与“位”的矛盾。这一过程也证明,回避矛盾、因噎废食,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导致矛盾更加突出。

应该有更好的思路。北京这几年为缓解停车难而采取的不措施,就可圈可点。比如,通过加强停车场规划和建设,积极增加停车资源供给;通过大力发展公交、提高便捷度与舒适度,以“替代效应”减缓机动车、停车位的需求。一些缺少停车位的老街区,通过社区自治、合理规划使许多车位“无中生有”、“错峰泊车”;一些机关大院,尝试下班后开放停车场供居民使用。这些可贵的挖潜探索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既避免乱停车的“公地效应”,也减少“画地为牢”造成的资源浪费。这些做法和思路,理应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推开。

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以最大化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为目标。在资源极度稀缺的当下,尤其应该尽量避免简单地靠提高门槛、加强管制来减少需求。城市治理是复杂的难题,“堵”要科学,“疏”更紧迫,只有最终加强和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彻底解决停车难题。

余荣华

“医而忧则武” 只能是权宜之计

11月5日,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医患矛盾,上海华山医院邀请宝山公安分局专职教官倪军向医院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时的正确自卫以及安全的现场处置方法。培训讲座吸引了大批医护人员参加。(11月6日《新京报》)

“武”字拆开来,就是“止戈”,古人也说,“夫武,定功戡兵。故止戈为武。”使用武力或者说练武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争执。这么说来,医护人员参加相关培训,增强自卫能力,学习应对和处置暴力侵害,对于他们在遇到暴力侵害时保护自己和同事的人身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却有些怪异。毕竟,医生的手是拿笔、手术刀和注射器的,而不是应对暴力侵害的。暴力侵害对于他们来说,原本不搭界。或者说,他们遭遇暴力侵害的概率,原本不应该与其他普通公众有什么差别。

医护人员积极学习自卫术,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但却是件让人悲哀的好事。因为,当某个群体需要通过学习自卫术来给自己安全增加一层保护的时候,说明这一群体遭遇不法侵害的概率远远大于普通公众,其所遭遇的不法侵害也必然与这个群体的特点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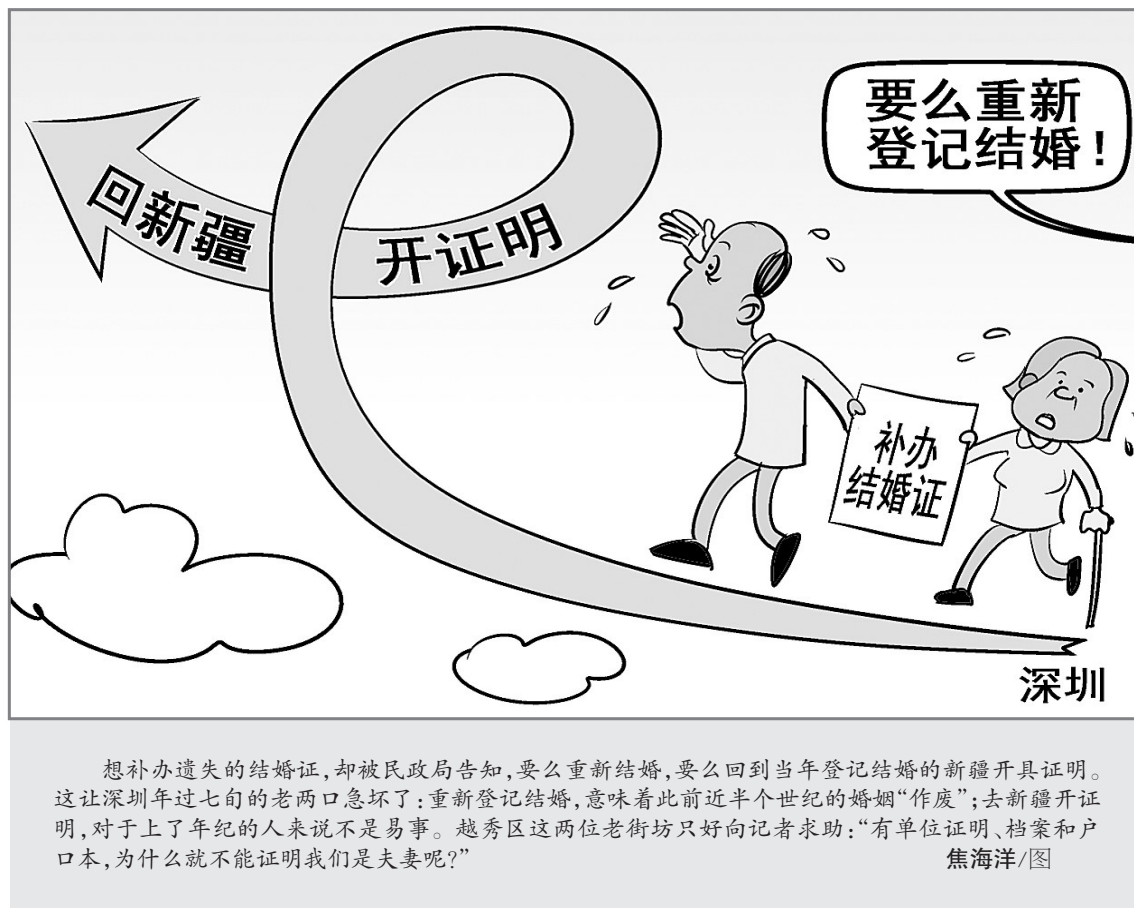
医护人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患者,他们与患者之间的纠纷,都集中在医疗服务上,如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患沟通、看病难看病贵等。近几年发生的针对医生的暴力案件,以及时有发生“医闹”,大都与此有关。这些问题,有些可以通过加强服务和管理的解决或避免,有些则很难避免,如医疗事故等。面对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是,由于缺乏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医患之间长期积累的不信任以及对司法机构的不信任等原因,法律途径得到的结论和结果,往往很难让患者及其家属满意或信服。“医闹”和极端的暴力事件,大都因此而生。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解决,即使医护人员个个都练成了武林高手,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恐怕也很难杜绝,只会随着安保措施的加强而变换冲突爆发的形式。

但是,由于根本性的问题大都属于制度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所以,从现阶段来说,在医院里增加保安、教医护人员防身自卫术等,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是个不错的办法。只是,这些办法只能是权宜之计。

张楠之

补办结婚证



想补办遗失的结婚证,却被民政局告知,要么重新结婚,要么回到当年登记结婚的新疆开具证明。这让深圳年过七旬的老两口急坏了:重新登记结婚,意味着此前近半个世纪的婚姻“作废”;去新疆开证明,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不是易事。越秀区这两位老街坊只好向记者求助:“有单位证明、档案和户口本,为什么就不能证明我们是夫妻呢?”

焦海洋/图

以德润心 以文化人

近年来,一些被冠以“强官”、“能官”、“儒官”的官员,屡因涉嫌违法犯罪而落马。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干部受贿犯罪,呈现边“评优”、边腐败的现象。由此,技术专家型干部的腐败问题,引起社会的关切与思考。

诚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治本之策。但“不愿腐”的自我约束机制,同样是源头上的治根。这种自我约束,源于美德的滋养、文化的涵养,表现为原则与底线的坚守,清正与廉洁的追求。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那些技术专家型的干部来说,有没有这种自我约束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廉与贪、成与败的迥异之路。

历史上,对于有才者来说,有没有德,德能不能养其才、润其才,更是决定了其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明朝权臣严嵩天赋极高,19岁中举,25岁录进士,可谓稀有“天才”。但他手握重权时却胡作非为,以权谋私,抄其家时发现大量黄金、白银。而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怀、“不置私产,身后无余物”的操守,则使其效国为民的才智得到了极致发挥。故有史家认为,弱小蜀汉之所以能对魏国取攻势,其决定因素乃诸葛亮的精神品格和政治策略。

先哲有言:“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

学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陈云同志讲:有德无才办不成事,有才无德办坏事。李建业、张曙光等落马者表明,若官德卑劣、心术不正,则才学越高而邪念越多,能力越强而贪腐越深,魄力越大而危害越烈。那些技术专家型干部走上贪污腐败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被选任时重才轻德,用权时恃才损德有关。那么,如何以德润心、以文化人,才能使他们远离腐败呢?

前不久,中央给41名省部级官员开设“廉政课”,进行廉洁从政专题研修。学习方式很灵活,地点也不限于校园。学习内容不仅有理论知识,还有具体的案例,包括廉政模范和反面教材纪录片。这无疑廉政教育的一种创新。顺着这个思路,以德润心、以文化人、廉政教育可以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作为一种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功夫,道德教育重在久久为功,难在不断创新。实际上,这种对各级干部思想的定期性“敲打”,十分重要,很可能就在某个关键节点上令一些人止步于腐败的悬崖。

治国之道,要在得人;用人之道,要在德才兼备。注重道德的教育锻造与自我养成,不断探索通达人心的德育路径,使德始终润其心,让文不断化其人,那么,清白地为政、干净地干事,就会成为各级干部恪守的心灵约定。

马祖云

改作风要『抓大放小』

从小事做起,从具体抓起,扭转陈年积习,形成新的风气,改作风的正能量在点滴汇聚。“公款贺卡禁令”发出后,赢得普遍赞誉。“抓大”形成威慑,“严小”养成习惯,进而习惯成为自然,这正是我们党反“四风”的鲜明思路。

与此同时,也有一种担心:正是因为事情小,重视程度上会不会不打折扣?也因为大具体,整治起来会不会一阵风?还因为太微观,执行起来会不会滋生出各种“变体”,进而演变成转嫁摊派?

任何一项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常,等于白抓。贺卡虽小,但求精美比奢华讲档次的风气如果不刹,就会变成衍生“大患”的恶疾;严禁“公款贺卡旅行风”的切口虽找得小,但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却是直接关系到“四风”决心、中央禁令公信力的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面对小切口,同样要有大动作,做好常抓不懈、制度紧锁的大功课。

张鑫

治理刁难症从重申常识开始

近日,公安部要求切实解决办证办户口难问题,要求进一步简化办证程序,方便群众。比如,户籍信息明显错误的要马上改;过去登记错误的要主动查主动改;手续材料不全的,要提供书面清单,方便群众减少跑的次数或者到原籍地的往返等。

显然,这是公安部对前一阶段中央媒体披露的“北漂青年为办护照往返老家六次”、“孕妇跑社区20趟仍未办下准生证”等事件的回应。目前,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上到国家部委,下到基层政府,对民众呼声的确实为重视了,也表现出了让人欣慰的高效的行动力。“洗洗澡,治治病”的理念,有了现实疗效。

但是,之所以列出公安部的具体要求,其实是有原因的。上面的这些具体要求,不涉及到复杂的技术,也

不存在落实的现实障碍,只是是一些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常识,甚至可以说,只是对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作为主管部门的公安部,还不得不“手把手”地向下级单位落实这些常识,细想起来,多少有些“心酸”。

我们缺少的,其实不仅是常识,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和“公仆”意识。前段时间央视曝光的“不寒而栗”,这正是长期的“官本位”思想熏陶出来的脸,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敬畏心和同情心的脸。正是这样的脸,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影响了民众对某些部门的信任。

对此,公安部也坦承,问题不是缺少规章制度和便民措施,关键是没

有很好的落实。本身尚有待落实。但承认问题,是亡羊补牢、落实行动的前提。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羊圈的洞不止办户口难这一个,“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以及脱离群众的不良习惯,又岂止存在于公安系统?其他部门、机构,不妨也向公安部学习,谁要学谁人,一律追究责任,效果必然不错。

被动地“亡羊补牢”,显然都不应该是服务部门的作风。现在正是群众路线实践教育的当口,能否举一反三,主动出击,对作风进行一次全面涤荡和清理,正是对各机关部门的一次检验。根治的关键是,要真正把“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民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明确的理念和宗旨,加上落到实处的监督,才能全面根治群众所厌恶的陋习。

刘志权